

与其在奔忙中焦虑,不如给自己留白

□ 姚华松

最近,我和一个学生聊起作息,她告诉我,自己每天早上7点出宿舍,白天除了吃饭外几乎都泡在图书馆,复习功课,准备考研,晚上10点半甚至11点回宿舍,洗漱后还得背背单词,躺在床上还得回想一下白天的知识点,甚至熬到凌晨一两点才睡觉。周末与平日基本一样,安排得满满当当。她的作息不是个案,很多同学大体类似,一些同学还存在不同程度的睡眠障碍。

我不禁想起20年前的我。那时候我也念大三,也在复习考研,但忙归忙,并没有太紧绷。我经常下午和男同学打一下篮球,下晚自习和女同学打一下羽毛球,周末与室友凑钱打打牙祭,十天半个月光顾一次学校附近的录像厅。

真正的知识与能力习得离不开社会,而不能只在学校找,拿着书本寻。社会知识、强壮体魄和健康心理,对于他们完整人格的塑造、在社会中实现人生价值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那么,我对他们有什么建议呢?我想到的是留白。

留白本是艺术作品创作的一种常用手法。而在我的专业领域,留白一词大意是:在城市发展与建设过程中,地方政府应该摒弃了单纯追求GDP增长而急于求成,用各种产业或基建项目把城市填得满满当当的做法。取而代之的是,城市应该保留一些田园、荒野、闲置地或生态保护区等白地,其目的在于维系与增进城市的自然与生态属性,让城市多一些荒山、田野、公园、菜地或绿植;让动物和植物有机会重新回到城市,城市的生物多样性特质

得到显著增强;给后续更优质的发展机会提供预留空间,让城市未来发展拥有更多可能性。

城市需要留白,人也需要留白。留白让我们暂别现代社会的高强度与高压,让我们有时间停歇、停顿和缓冲,让我们的大脑放空与休息,用有趣的事卸载我们承受的压力与不快。

我身边就有不少具有留白意识的朋友,有的热衷于周末徒步,去到没有信号的山野里爬坡越坎,与自然来一次全天候的深度接触;有的痴迷于拍Vlog,时不时拍摄、剪辑、修饰和发布短视频,做一个日常生活的记录者;有的背包里随时装着各种石头,得空的时候与石头说说话;有的挂念天光墟(夜间集市)的各种旧式玩意儿,痴迷于用时间凝结而成的东西。

通过留白,我的这些朋友不约而同

地收获了快乐与轻盈,不仅由此提高了他们的学习或工作效率,也极大改善了生活品质。留白不是虚度光阴,更不是自甘堕落。留白秉持过犹不及和休养生息的原则,主张谋定而后动三思而后行,致力于谋求各种结构性平衡。

于城市而言,留白是自然环境与建成环境的平衡,是生产、生活与生态的平衡,是当下与未来的平衡。

于个人而言,留白是工作与生活的平衡,是事业、家庭、社交、运动、兴趣和娱乐的平衡,是身体与灵魂的平衡。

于社会而言,留白是现代性(的后果)与抵抗现代性(的后果)的平衡,是快节奏、高压与慢生活、低压的平衡,是增长与发展的平衡。

留白是一种大智慧,愿更多人拥有这种大智慧。

冰点时评

从严掌握从宽幅度,让恶性犯罪得到应有惩罚

□ 杨鑫宇

2021年7月1日,两高联合印发的《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在全国法院、检察院全面实施。据报道,《指导意见》细化了23种常见犯罪的量刑以及缓刑适用,其出台目的在于进一步规范量刑和量刑建议工作,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增强量刑公开性,实现量刑公正。有媒体注意到,在《指导意见》中,两高专门强调对黑恶势力犯罪、严重暴力犯罪、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等危害严重的犯罪,在确定从宽的幅度时,应当从严掌握。(澎湃新闻7月7日)

在这段表述中,互为反义词的从宽与从严同时出现,体现出的是司法机关在坚持宽严相济这一刑事政策原则的基础上,对黑恶势力、严重暴力、性侵未成年人等恶性犯罪的高度重视。一方面,依照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任何犯罪分子,都有依照其犯罪情节轻重与认罪认罚表现,得到从宽处理的可能;另一方面,对那些犯罪手段极其残忍、社会影响特别恶劣的犯罪分子,从宽倘若来得太过简单,不仅与公众对法治和正义的期待不符,也会影响司法机关乃至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公信与权威。

在《指导意见》出台前,曾有多起案件先后引发过社会对有关议题的讨论。其中,发生于2018年的杨光毅奸杀女童致死案,是最典型的代表之一。当时,这起案件被民间称为百香果女孩案。案件中的受害者,是一名在出门摘百香果补贴家用时不幸遇害的10岁女孩,她的遭遇令人倍感同情。

2019年7月12日,杨光毅一审被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2020年3月25日,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在二审中采纳了被告方的辩护意见,以杨光毅有自首情节为由,对其从宽处罚,将死刑改判为死缓。二审

宣判之后,此案迅速在舆论场上引发巨大的波澜,不理解、不认同二审判决的声音此起彼伏。2020年5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决定对该案调卷审查,并于同年11月11日,指令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另行组成合议庭对该案进行再审。2020年12月28日,杨光毅被改判死刑,并于2021年2月2日执行完毕。

在这起案件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司法机关对从宽幅度的把握是多么重要。在类似案件中,法律条文的作用,是划定一条不可逾越的底线。在这条底线所许可的范围之内,司法机关还需以审慎的态度,正确行使其自由裁量权。在杨光毅一案中,二审法庭之所以从宽处罚,是因为法院认定杨光毅确实有自首情节,依法可以从轻处罚。但是,可以从轻,不一定等于应该从轻,更不等于必须从轻。

再审判庭判处杨光毅死刑时专门提到:杨光毅虽有自首情节,但结合其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及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法对其不予从轻处罚。在这类恶性犯罪案件中,司法机关只有做到从严把握从宽幅度,才能确保从宽的结果令人信服,经得起法治原则的检验。如果作出恶性犯罪行为的犯罪分子随随便便就能得到从宽处理,不仅对受害者不公平,也会损害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落实效果。

20世纪后期以来,恢复性司法的观念逐渐在各国法律界产生影响,在这种观念中,刑法工作的目的不是为惩罚而惩罚,而是修复和补偿在犯罪中受到侵害的司法。与此同时,基于避免冤假错案、降低司法工作成本等考虑,包括我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刑事政策都趋向于宽和,对死刑的运用也极为谨慎。整体而言,这种趋势对法治建设与社会和谐带来不利。

但是,在这一过程中,若片面理解相关政策背后的精神,就容易从为惩罚而惩罚,倒向能从宽就从宽的另一个极端,而每一起本不该从宽却得到从宽处理的案件,都会动摇公众对司法机关的信任。如今,两高明确要求,在恶性犯罪案件中,从严掌握从宽幅度,就是要避免类似误区。

重罚大数据 杀熟 让消费者不再被收割

□ 柯锦雄

理想状态下,企业会履行自身的社会责任,尊重用户隐私,维护行业的健康发展。但很多时候,现实却是骨感的。过度收集个人信息、滥用用户数据的行为也已经不是某一家的问题。有时,越是大数据平台,掌握的数据量越大,对于消费者权益的影响也会越大,而用户却缺乏可供选择的其他平台。

作为地方监管部门的一次尝试,《深圳经济特区数据条例》明确了用户作为个人数据主体的决定权,规定处理个人数据应当征得自然人的同意,在其同意的范围内处理其个人数据,不得通过误导、欺骗、胁迫等违背自然人真实意愿的方式获取同意,并对同意规则的例外情形作出规定。

可以说,对于当前数据市场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该条例都有所涉及。但需要说明的是,监管不等于禁止,有形的手并不能取代无形的手,而只是希望规范数字化的手。该条例首次认可了数据处理者在自然人撤回同意前基于同意进行的合法数据处理的有效性,这意味着企业实际可以依靠此前的数据分析内容,继续为用户提供服务。

在大数据时代,我们无法逃离算法对自己的分析,但我们有权拒绝算法对我们的算计。有关互联网,曾经有句名言:你在网络上,你无法知道对方是一个人还是一只狗。而在如今的网络世界,人们更切身的体会则是:你对自己的了解甚至没有平台多。对用户而言,被了解的目的是为了得到更好的服务,而不是被精准收割。深圳市的此次监管尝试,无疑是对这一原则的重申。



国家发展改革委官网公布的《十四五循环经济发展规划》提出,规范发展二手商品市场。推动线下实体二手市场规范建设和运营,鼓励建设集中规范的跳蚤市场。鼓励在各级学校设置旧书分享角、分享日,促进广大师生旧书交换使用。鼓励社区定期组织二手商品交易活动。(中国新闻网7月7日) 漫画:徐简

旧书分享

□ 郭慧岩

近日,旧衣回收箱又上了新闻。据报道,今年4月,浙江省浦江县检察院接到不少关于旧衣回收箱的举报。经查,杭州某再生资源有限公司等多家企业未经审批擅自将多个公共场所放置了300余个旧衣物回收箱。且涉事公司将市民捐赠的一部分衣物未经消毒投入市场,相关部门对当事人进行了约谈,实施行政立案查处。

其实,旧衣物回收箱乱象并不是新问题。之前就有媒体曝光,不法分子在网上自行购买旧衣物捐赠投放箱,放在高档小区,将回收的衣物以废旧布料的形式变卖;一些无相关资质的废旧衣物回收公司打着公益或政府实事项目的旗号牟利。令人哭笑不得的是:有位老人在逛服装展销会时,竟然买到了自己曾捐赠的裤子,而当初这位老人就是通过旧衣物回收箱捐赠的。

我所在的小区门口也有旧衣物回收

箱,但我始终不放心将衣物放进去。一方面我不知道这个箱子来自哪儿,另一方面也害怕助纣为虐。

旧衣物回收本是资源再利用、传递爱心的公益项目,如今,在一些地方却变成不法牟利工具,是对社会资源的浪费,不能任由这种严重透支社会爱心的现象持续下去了。

堵住漏洞,让不法分子无机可乘。慈善法规定,开展慈善活动应当遵循非营利原则。从城管到小区物业公司等相关单位,要做到守土有责,审核、把关责任一样也不能少。一旦发现来路不明的旧衣物回收箱要尽快处理,以免市民上当受骗。

对于利用旧衣物回收箱牟取不正当利益,甚至诈骗或者盗窃的,要依法依规予以严惩,同时对没有尽到审核把关的相关单位、部门及责任人也要追责。

既堵也要疏,一些不法分子之所以能得逞,利用的是人们的捐赠需求,一些地区和福利机构也确有需要帮助的需求。如何搭建好、管理好这个满足

双向需求 的渠道显然迫在眉睫。

该事件中,当地明确提出从6月份开始对旧衣物回收箱实行统一招标、管理,实现旧衣物回收箱规范化运营。这种做法给其他地方提供了借鉴。

还可以借鉴当下流行的溯源机制,为每个回收箱设置二维码,人们通过扫描,不仅可以知道回收箱的信息,还可以了解到捐赠的衣物流向了哪里。信息公开透明更利于社会监督。在技术成熟的情况下,管好旧衣物回收箱不应该是无法解决的难题。

对于网上可以购买到旧衣物回收箱的现象,相关部门也要及时介入与监管,对售卖商家要加强管理,明确购买资质查验等职责。

说到底,旧衣物回收箱装的应是人们的善心,而不是不法分子的贪婪。不能让旧衣物回收成为不法牟利工具,不能让旧衣物回收行业偏离公益轨道。想捐赠的能放心捐赠,需要帮助的能够得到帮助,才是设置旧衣物回收箱的初衷。

给监控设禁区:没人愿意随时裸奔

医院病房和检查室、集体宿舍、公共浴室、卫生间、更衣室、哺乳室等区域,也可能安装了监控摄像头。

或许,在一些管理人员看来,这么做也是为了大家好,比如,发生了盗窃、抢劫、摔伤等意外情况时,有这样一双无所不察的眼睛,既能监控报警、救死扶伤、惩恶扬善,也能留存资料、以备追查。只是,对于那些被摄像头监控的人员,却必须忍受在摄像头下变成透明鱼缸里的金鱼。

越是文明的法治国家,越注重对公民个体权益的保护,而保护公民并不一定以牺牲公民隐私权益作为代价。我国民法典明确规定,自然人享有隐私权,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空间、私密活动、私密信息,依法受到保护,不被他人非法侵扰、知悉、搜集、利用和公开。立法的

进步,映射着文明理念的跃升,也驱动着隐私权保护升级。

近来,屡屡曝光的出租房安装摄像头、试衣间被偷拍等乱象,都给隐私权保护敲响了警钟。写入法律的隐私权利,越是分解细化,越是有可操作性,就能更有力地保护权利。深圳以地方立法的形式,明确禁止安装范围,从一审核明确的旅馆客房、医院病房和检查室、集体宿舍、公共浴室、卫生间、更衣室、哺乳室,再到修改一稿新增的医院诊室、试衣间,隐私权保护的区域在不断扩大,让公民在进入上述区域时,不再被被侵权之虞。

不仅如此,草案修改一稿在划定红线禁区的同时,还对系统安装范围作进一步归纳分类,并将住宅小区、工业园区、教育、医疗和社会福利机构等区域或者单位建设、安装系统限制在公共区域。公共的归

公共,私人的归私人。从之前的满天飞,到如今的分区装,将监控摄像系统贴上公共区域的专用标识,有利于与私人领域严格区分开来,避免个体权益被殃及池鱼。将采集的个人敏感信息用于公共传播时不进行匿名化处理的法律责任单列,明确最高可处百万天价罚款,规范查询、使用的程序等,这些富有创新的举措,既有利于信息正常使用,又有助于更好地保护公民个人隐私,也为国家立法辟开了一条路。

立法有多真诚,权利保护就有多深入。隐私权保护愈精准完善,也愈加抚慰人心,让人对立法出台充满期许。当然,在做好减法,保护公民隐私权的同时,如何做好加法,保障医院诊室等特定区域的公共安全,也应成为立法者思考的课题。

□ 刘婷婷

医院诊室、试衣间等不得安装监控,人身、财产等权益遭受重大损害的利害关系人若需要紧急查阅视频监控相关信息时,系统管理者应配合。近日,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审议的《深圳经济特区公共安全技术规范》进一步细化禁止安装范围,并且优化利害关系人紧急查阅、调取程序。

在现代科技力量的助推下,我们似乎进入了一个摄像头不要钱的时代。走在大街小巷,你已进入监控区域,的标语屡见不鲜,进了小店买东西,一瞅老板面对的电脑屏幕,也早有摄像头将各个货架情况一网打尽。当然,这些都是很正常的摄像监控,让人浑身不自在的是,在旅客客房、